邱政凱102062209第十四單元

這次的主題依然是圍繞著經濟跟工作的社會學面向。

第一篇是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這篇文章作者藉由訪談了百餘位在美國一家大型企業「Amerco」工作的員工，揭露了在許多人民眼中逐漸改變的工作跟家庭經營相關的觀念。作者一開始的觀察出發點是，在Amerco有提供許多彈性休假的策略，包括部分工時在家進行、孩童照護假跟flex time─一種讓員工重新分配工作時間(然而總工時不減少)的策略，然而大部分的父母員工都不會選擇除了flex time以外的策略。另外一點作者觀察到的現象就是Amerco的員工儘管絕大部分都有著很長的工時，卻鮮少有人對工作時數提出抗議。作者提出了兩個一些猜想，像是擔心工作時間減少會影響收入，或是員工害怕主動提議減少工時會變成優先裁員對象。然而這兩個假設都被作者後來的觀察推翻。所以，在Amerco員工中出現的這些不尋常的現象到底該如何解釋？

作者近一步調查才發現，在很多員工心中，「工作」跟「家庭生活」跟一般我們的想像已經完全對調了，不是兩者的邊界開始模糊，而是開始對調。Amerco的員工，尤其是女性員工，會抱怨一旦回到家之後總有堆積如山的「工作」在等著他們，孩子的照護、家事的處理…然而在工作時，他們能跟朋友聊天，一起為了業績和榮譽感努力，公司尊重員工的能力和自主規劃，且會提供員工長期的訓練和栽培，相對起來，在家的時間要處理的例行「公事」：照顧小孩、煮晚餐、打掃…反而讓許多員工感覺起來更為繁瑣和勞累。作者還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以前是工作環境被「泰勒化」，然而當今的管理文化卻逐漸提倡尊重員工的心靈健全和適當發揮；反而是當今的家庭生活在許多人的眼中越來越「泰勒化」，每天固定的代辦事項和家務，讓家庭生活反而在很多人心中變成了一成不變的繁瑣工作。儘管這個現象已經是逐漸普遍的事實，但是還是有相當多人在這樣的現象中會有很矛盾的心理，工作繁忙而亟須把家庭工作「泰勒化」的人們，主要是中產階級女性，反而會對於自己這樣的需求感到罪惡感，認為家庭的經營不該是這樣子的。

第二篇是朱敬一和康廷嶽的「經濟轉型中的社會不公平」。

這篇文章以去年的三一八學運做為楔子，提到三一八是一個代表性的爆發點，點出的是當代青年對社會資源的不均等分配和階級流動停滯以及居住正義的問題早已累積許多不滿，嘗試許多體制內的方式卻總是碰壁，從而導致了這次近年來最大的一波公民不服從運動。文中主要以五個面向來探討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分別是「薪資凍長」、「所得分配」、「居住正義」、「子女教育」以及「階級流動」。「薪資凍長」的部分，作者用數據指出近年台灣的GDP仍然有微幅成長，然而薪資卻已經多年來停滯甚至倒退。作者認為主因是全球化的產業轉型，台灣並沒有順著這波趨勢跟著轉型與提升競爭力，反而是把廠商搬到東南亞和中國，繼續維持舊時代的生產模式，這種「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方式可以增加GDP，卻無法把相應的訂單擴充投射到國內勞動需求的增加。一種最普遍的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指出台灣這種生產模式會在國際貿易的平衡下讓薪資向設場的國家，東南亞，中國，看齊，從而導致薪資凍長。所得分配的部分，作者主要指出台灣政府近幾年來的稅制改革明顯是向富人靠攏，減低贈與稅、遺產稅、證券交易稅、土地增值稅，卻反而提高所得稅，造成所謂的「棟心的人增稅，有資產的人減稅」的弔詭現象。居住正義的部分跟前述稅制有關，政府的稅制改革根本是鼓勵炒房，從而讓一般人民對於購屋的夢想越來越遙不可及。子女教育的部分，作者點出了擁有較多資源和補助，而且通常是最少中低收入戶就讀的公立大學反而有最低的學費，而擁有較高中低收入戶學生的私校反而擁有較高額的學費，產生不正義的循環。另外就是高教泡沫化，廣設大學的結果讓學歷貶值，透過子女教育來翻轉階級變的更加不可能。階級流動的部分，作者則批評了目前遺產稅的設計制度讓富人更容易的傳承階級給下一代而不利於階級流動。

整體而言，政府若不對台灣轉型的失利、稅制的崩壞、教育的扭曲提出政策面的解決方案，社會不公平的問題可能很難等到改善的一天。

最後一篇則是「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危機」的選讀。

作者提出這個時代台灣人面臨工作崩化的幾個面向。首先是非典型就業擴大。台灣越來越多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定期契約工作或是派遣工作等等非典型的工作。然而這類工作最大的危險就在於太多法律漏洞可以鑽，雇主經常遊走法律邊緣侵犯勞工權益，政府也不積極改善法條或取締違法業者，而就算違法侵犯勞工權益被抓到罰錢也常常是不痛不癢的金額，造成這樣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第二點是工作貧窮。工作貧窮意味著即使有工作卻仍然無法脫離貧窮的困境，而這部份跟非典型就業的擴大有直接的關聯。第三點是窮忙族的現象，相對於非典型就業者，窮忙族大多有穩定的工作，然而台灣近年來「平均工時延長，平均薪資減少」的狀況越演越烈，整個職場結構對勞工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加班時間越來越長卻沒有明顯的收入增加，許多人甚至會換上職業疾病或是過勞致死等等。

要避免就業崩壞，作者認為政府除了要放寬貧窮補助標準、積極促進就業(而非補助低收入)以及保障非典型就業者權利外，一個很大的結構問題就是整個社會氛圍經常把工作貧窮給「個人化」，認為一定是勞工自己不夠努力所造成，而無法看透整個結構如何限制和剝奪勞工的發展和權益。

其實看到這週的文本我整個感觸很深，去年親自參加的太陽花學運居然已經登上了文本。不過這正也揭露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逐漸的認知和體認到了我們遇到的很多困境，就業、購屋…其實背後是有著結構性的因素持續的在控制著我們的生活，而且這些不公平的結構是亟需被挑戰和調整的。另外就是Time Bind這一篇提到的現象讓我有點懷疑在台灣當今的職場和就業文化下是不是也有一樣的現象？看看台灣慣老闆們提倡的企業文化其實我對這點是存疑的，我並不認為在台灣把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想像對調的狀況是普遍存在的。台灣政府若不能當領頭改變台灣的工作文化和產業結構而放任權力者對勞工的剝削，只怕不用多久的時間台灣真的要變成一個硬撐也住不下去的鬼島了。